**十九世紀末的柏林女僕**

**摘要**

十九世紀末，德國工業化過程中，女僕是當時重要的女性工作，1905年在柏林工作的女僕，計有148000人，約三分之一在柏林工作的女性，這群工作者大部分是由鄉下湧入城市的年輕女性，她們期待的是輕鬆的工作，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獨立自主的空間，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她們面對的常是刻薄的雇主，惡劣的居住環境，超長的工時(每日12-16小時)，微薄的薪資，不自由的生活，不平等的聘僱條約，是被剝削的社會底層，作品帶有自然主義色彩並特別關心弱勢女性的作家克拉拉菲比(Clara Viebig1860-1952) 1901年出版的《每日的麵包》(Das tägliche Brot) 描寫兩位鄉下女孩到柏林從事女僕工作的情況，道出女僕工作的辛酸。1985年柏林的德國文物博物館展出僕人的世界時，特展出這本小說。此書也多次在歷史學或民俗學研究上被引用，說明當時女僕的生活實景，在這篇論文中將就當時的文獻記載，社會學的研究資料，女僕的自傳等，探討當時女僕生活的實況，並與作家小說中所呈現的女僕生活作一比較，比較的目的並非檢視作家是否描寫出真實的情況，而是探討作家從何視角呈現社會問題，以怎樣的文學筆法突顯這一群在生活中不斷忍受挫敗的小人物，不同階級的意識形態又如何交會與衝突。

關鍵詞

自然主義、底層階級、女僕、

**僕役大會**

十九世紀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鄉下的農務，經由機械化而簡化，人力的需求減少，很多農村的人口湧進大城市，進入工廠謀生，或是為人幫傭，1800年有14000的女性從鄉下來到柏林，1905年已有九萬人[[1]](#footnote-1)，其中超過一半的人當女僕，他們年齡大概是15到20歲之間。一般人的印象中，女傭的生活應該比一般在工廠中工作的女性還好，因為她們在受雇的家庭中包膳宿，如果有女僕對其雇主不滿意，常被視為例外，一般的文獻中也認為女傭的生活不錯，例如逢勞賀(Elfe von Rauch)寫過，

女傭有個家，有個穩定的住所，好的伙食，當女僕的好處是，可以為 她將來持家，當個稱職的家庭主婦做準備。所以找妻子的人常會問女方是否曾當過女傭，因此她們都對當女傭的這段時間心存感激。[[2]](#footnote-2)

另外有篇在《邊界信差》(*Grenzboten*)的文章也這樣寫:

女傭的工作不只提供這些女孩子身體和道德上非常大的保護，也提供她們將來持家教育小孩的學習機會，她們有固定的薪資，較好的食物和住所，服裝也比較好，她們整個經濟情況比一般從事其他工作的女性來得好。[[3]](#footnote-3)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1899年夏天，柏林舉行了僕役大會，發起人是記者帕爾曼(Perlmann)[[4]](#footnote-4) 和一位曾當過僕人的施洛德(Schroeder)[[5]](#footnote-5)，參加僕役大會的人約有四百至七百人，參加者不只是僕人，也有政府人員和雇主，發言者大部分是男僕，女僕很少發言，他們主要抱怨的事項是，過時的僕役條約(Gesindeordnung)[[6]](#footnote-6)，匱乏的疾病保險，惡劣的居住環境，僕人紀錄簿的負面影響，主人不人道的對待，強調僕人的權力，對抗不公平的對待。[[7]](#footnote-7)這次聚會後，十月份時較活躍的女僕成立了「女僕互援會」(Hilfsverein für das weibliche Hauspersonal)。社團會員只有女性，主要訴求也是，撤除僕役條約，取消換工作時，取消繳五十分尼給僕役公基金的規定，給於個人在職證明，健康的睡眠環境，足夠的食物，好的待遇，一周一個晚上的假。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像其他工人受到雇主人性的對待，改善生活的條件，而未提到提高薪水。僕役大會的無秩序和混亂，引起市民階級報章的訕笑，諷刺他們的訴求，對他們的訴求並不以為意，某些市民階級更認為僕人將主人的私事公開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些舉動更引起僕人們的不悅，進而將自己的工作情況，受到的不平待遇公諸於報紙上(參考Walser 1986:98-99)。女僕惡劣的工作環境引起記者史地利西(Oskar Stillich)研究的動機，於是他寄了九千份問卷給柏林的女僕和雇主，調查女僕實際的生活情形，從女僕回收459份，雇主87份，會填此問卷的雇主應該是贊同社會改革，對弱勢團體同情者，而回填此問卷的女僕也許對雇主不滿，或是不顧雇主的壓力而回填的，所以結果可能較偏向女僕的立場。1902年這份研究報告出版了，書名為《柏林女僕的生活情況》(Die Lage der weiblichen Dienstboten in Berlin)。這是第一本有關女僕研究的資料，這本書讓我們對當時女僕的生活有一概括的了解，也是後來研究者常引述的文獻。

被譽為艾菲爾(die Eifel)鄉土作家的克拉拉．菲比自二十三歲開始就定居柏林，她寫了十三部關於柏林的城市小說[[8]](#footnote-8)，其作品風格受到當時鄉土文學運動(Heimatkunstbewegung)和自然主義風潮(Naturalismus)的影響，因此也被稱為「佐拉的學生」**[[9]](#footnote-9)**、「描寫環境的師傅」**[[10]](#footnote-10)**。菲比的柏林小說《每日麵包》所描寫的是柏林女僕的生活，菲比雖出身官宦世家，但自父親逝世後，她到柏林發展，在她的生活小傳中(Lebens-Abriss)提到，在她所創造的小說人物中，她和《每日麵包》的女主角可憐的蜜娜(Mine)最能感同身受，蜜娜從德國東部鄉下到城市時，那種被城市淹沒的感覺，正是她親身經歷的過程，當時菲比的母親只有一點點寡婦的撫恤金，但是她還是維持著以前生活的排場，所以身為女兒的菲比，必須節儉度日，辛苦持家，做很多家事，以維持家裡貴族生活的開銷(Viebig 2002:31)。菲比本身可說體會到在那個時代維持階級表象的辛苦，自己也為了省錢，做了許多女僕需做的家務，因此能體會女僕的辛苦，對於她寫這部小說的動機，則是出於自己生活的經驗，她指出，

從我的窗口看出去正是街道對面的一家賣水果蔬菜的商店，位於地下室，我每天看這些來來往往的顧客，後來越看越有趣，好像自己也置身於這些女僕的對話中，我聽著她們如何東家長西家短的聊天，抱怨，就如那個胖胖的菜販，我也對他們每一個人的遭遇命運產生興趣。這家蔬果店，可說是這本小說和一些人命運的起點(Viebig 2002:93)。

她希望藉由這小說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經由了解而諒解 (Viebig 2002: 94)。可見菲比致力於當一個傳達者的腳色，希望藉著她客觀的傳達，促進雙方的了解，這本小說寫出了一位鄉下女孩子到城市幫傭所有可能碰到的問題，大城市的孤單，在雇主家孤立的感覺，不能常外出也不能有訪客，主人們吃得好，而僕人的飲食惡劣，過度的工作，缺少睡眠，主人的兒子可能性侵女僕，一懷孕就被趕出家門等問題。由於她的描寫貼近事實，因此研究柏林女僕生活的歷史研究常引用菲比書中的描寫[[11]](#footnote-11)，但是小說還是內涵虛構的情節，作家的想像，這篇論文將當時的文獻記載，社會學的研究資料，女僕的自傳等，對照小說的虛實成分，以凸顯作家的意圖。

**女僕的原生家庭**

根據史地利西的調查女僕的出身家庭，手工業者佔27%、工人24%、小農戶17%、小公務員12%、做小生意的7%、未回答者13% (參考Stillich 1902:109)。 從這數據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女僕來自德國的中間階級(Mittelstand)[[12]](#footnote-12)，但是史地利西認為大部分的女僕來自「社會的最底層」。他認為當時的手工業者生活窘困的情形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差不多，即使是小公務員的物質生活也沒比工人好多少。孔拉德(Else Kesten-Conrad) 1910分析德國婦女聯盟調查十三個城市的女僕的資料得出的結論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女僕並非來自社會的最底層。事實上兩份的調查報告結果數據相似[[13]](#footnote-13)，只是觀點不同。對於他們的家庭背景可以如同維爾玲(Dorothee Wierling)所說的。大部分的女僕出生自手工業家庭或農家，家庭的物質缺乏，為了維持家計，所有家庭人員皆須工作，他們的經濟不穩定，沒有受過教育訓練(Wierling 1987: 27-29)，一位裁縫師的女兒這樣說他的原生家庭，

我父親是裁縫師，他很喜歡人家稱他師傅，雖然他沒有工作室或學徒，租　的小公寓只有一個房間，是我們一家六口睡覺、活動、煮食的地方，也是我爸爸工作的地點，他坐在旁邊堆滿破布和補丁的桌子旁，從早到晚縫縫補補，媽媽則幫忙他。[[14]](#footnote-14)

根據維爾玲(Wierling)的調查報告指出，鄉下農夫的家庭客廳和臥室是同一個地方，睡覺時男女也沒分開。所謂的小房間指的是廚房和主要臥室，客廳是小孩睡覺的地方，經常整個家庭只有一個房間，小孩子則睡地板，沒有一個被訪問者擁有自己的床，最好的情況是三個姊妹擁有兩張床，輪流使用，這種情況不只是鄉下的情形，城市裡的小市民也是同樣的情況(參考Wierling 1987: 34)。當時鄉下的小孩都需幫忙家務，很多女孩子在家就需清掃家裡、熱食物、幫忙洗衣服等，最重要的是照顧年紀小的弟弟妹妹。1882年在上法蘭克(Oberfranken)一個做籃子的工匠家庭吃的東西如下，「大部分做籃子的工匠在星期天和節日才吃肉，馬鈴薯和咖啡是平常主要的食物，所有的收入只能勉強應付這些食物和日常的必需品」[[15]](#footnote-15)。代用咖啡和黑麵包是無產階級家庭的早餐，牛奶湯和白麵包表示家庭經濟好一點，1904的統計顯示1770000的學童須經常在農場幫工賺錢，其中有696.439位女生，她們常還需做家事。能幹和服從是教育的重點，是女孩幫傭時需要的一種人格特質，也是當時普遍為大家接受的社會價值觀(參考Wierling 1987:46-47)。當時的中間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無產階級差不多，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總嘗試著維持所謂中間階級的生活水準，怕自己淪為無產階級。雷麥(Franz Rehbein)在他有名的自傳《一個鄉下工人的生活》(Das Leben eines Landarbeiters)提到在他家裡早上一定要喝咖啡，因為他的父親說:「我們手工業者不能像工人一樣喝麵湯。」不過他們家十四杯的咖啡是由十三顆咖啡豆做成的[[16]](#footnote-16)。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家裡為了少一個吃飯的人，或多一份收入，往往鼓勵孩子離家謀生，女性也不例外，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包膳宿的女僕工作，是鄉下女孩子進城工作最好的選擇，有位1882年三月到柏林當女僕的女僕敘述其原因，

自從父親去世後，我的媽媽一個可憐的寡婦帶著九個小孩，親戚害怕需資助我們，就和我們斷絕交往，…我很高興能到柏林去賺很多錢，來資助我可憐的母親，除了我以外，家裏還有三個小弟妹需要照顧(Stillich 1902:　324)。

保樂維(Karin Pauleweit)在她研究的八位女僕作家提到，這些女僕小時候多少都感受到家裡經濟的壓力，他們的父母雖然很辛苦的工作，但也只能勉強維持生活，一位女僕提到她家的伙食，「平常我們的餐點是帶皮的馬鈴薯和二十分尼的劣質香腸，或一兩條的鯡魚，這是給一家人吃的一餐。」[[17]](#footnote-17)

　　大量的女性人口移動引起了鄉下衛道人士如教師神父地主等人的擔憂，認為這些女孩子到城市去除了打掃外就是享樂，有位神父形容這股湧向城市的風潮為「好玩的動力」(Wandertrieb) 」，「打掃、跳舞、錢是驅使年輕的女性進入城市墮落的深淵」(參考Ｗalser 1986:19)。他們擔心農村人口流失，也害怕女孩子為了作輕鬆的工作賺更多的錢，穿漂亮的衣服，抵擋不住城市中種種的誘惑而墮落。《每日麵包》兩位女孩進城的原因也如上述的情形。蜜娜(Mine)出生在農家，她家共有六個小孩，

有一個小孩必須離家，海資家(Harthel Heinze是她父親)的田不足以養活這麼多人，房子很小，總不能讓他們疊起來睡覺，若不是蜜娜下面出生的彼得（Peter）麗莎（Lisa）相繼在鴨子池塘淹死，她早就需離家了(10)[[18]](#footnote-18)。

她離家時，父親還一直叮嚀著她認真的工作寄錢回家。蜜娜是因家庭窘困，被迫離家賺取生活費用，鄉下人總覺在城市賺錢容易，對城市懷抱著夢想，「即使有錢農夫的女兒，也樂意到柏林工作一兩年」(10)。 蜜娜想到從城市回來的人，「有些人存了錢回家，嫁了好丈夫，或是在柏林嫁個不錯的對象，反正柏林到處是機會，工作輕鬆，薪水高」(10)。蜜娜的弟弟馬斯很羨慕姊姊可以到柏林，他說「在這裡真會被折磨死!不要當農夫，我真的不想當農夫，妳比較好，可以到城市去」(14)。《柏林女僕的生活情況》中的一位女僕提到她要到柏林當女僕而不到其他小城市去的原因是柏林的薪資比較高（Stillich 1902:324），蜜娜要離開家裡，面對陌生的城市，心裡非常的擔憂和掙扎。而和她同行的女孩貝爾塔到柏林的動機是要離開囉嗦的媽媽，到城市好好的「享受生活」(17)。貝爾塔的母親是個寡婦，沒田地，較像城市裡的人，「當蜜娜辛苦地在田裡幫忙時，貝爾塔則坐在窗邊鈎織東西」(15)。貝爾塔家裡旁邊的菜園經常雜草叢生，她不喜歡農事，喜歡穿著漂亮的圍兜站在門前和母親的顧客聊天，她懷抱著好奇冒險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到柏林。蜜娜和貝爾塔這兩位小說的人物，反映了當時女僕到都市工作的原因，和當時農村困苦的生活環境，其生活背景正切合當時農村的情況，擁擠的住屋空間，瀕臨飢餓的邊緣，小孩皆須參與勞動生產工作，但是作者刻意塑造了兩個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典型的農村女孩蜜娜到城市是為環境所迫，為了改善家計而進城。貝爾塔非出生農家，對土地較疏離，離開農村進入都市是一種冒險和尋求發展的機會，城市裡有許多新鮮好玩的事等她去經歷。兩者家庭背景也影響其個性和發展。他們對大城市工作的夢想，也是當時一般人對於在城市工作的看法。

**進城的過程**

一般鄉下的女孩到柏林工作，有時是透過認識的親友介紹[[19]](#footnote-19)，或是直接到柏林火車站找仲介所介紹，但是有些女孩在火車站就被仲介者帶走，遭到被騙誘拐的命運，於是1884年一些善心的婦女提供這些女孩一些幫助，1897年成立了「德國火車站服務團」，一些女性志工就在車站迎接這些女孩，給她們一些資訊，或提供第一夜的住宿，要找工作者可以到所謂的介紹所，1905年柏林有267處這樣的介紹所。最有名的介紹所在葉格街(Jägerstraße)[[20]](#footnote-20)。《每日麵包》的蜜娜則到柏林找她的舅舅。她的舅舅和舅媽開了一家雜貨店，他們是蜜娜母親口中的大財主[[21]](#footnote-21)，她的舅媽也兼差介紹女僕工作，這位舅媽是個勢利、錙銖必較的人，姪女暫住她家還須收費[[22]](#footnote-22)，而這位「大財主」住在當時五層公寓的地下室，俗稱出租軍營(Mietskasernen)，住家和店舖在一起，空間非常狹小[[23]](#footnote-23)，蜜娜和貝爾塔在這裡也只能睡在廚房由餐桌拼成的床，從她舅舅任詩克(Reschke)的住屋環境來看，鄉下人口中的大財主其實是城市中掙扎著生活的小人物而已，任詩克的家是故事環繞的重心，這家雜貨店是女僕們出入的重要場所，他們在此買菜，交換資訊，道人長短，兩位從鄉下到城裡的蜜娜和貝爾塔也把這裡當作她們換工作時暫時居住的地方。作者細緻的環境描寫，社會問題的呈現，明顯反映出左拉自然主義的影響，這地區是工人住宅區的舊柏林區及其以北的珣能堡(Schöneberg)。故書中任詩克家的雜貨店(位於Göben-und Kirchbachstraße Alvensleben und Winterfeldstraße)和菲比1900年後居住的安靜高雅的艾爾斯霍次街(Elßholzstraße)只隔著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 和植物園(Botanischer Garten)，書中的場景是菲比多年來活動的地區，對環境有細微的觀察和真實的描寫，她所描寫的是世紀之交典型柏林工人區的房子，有五層樓，從地下室到頂樓聚集了租屋者，狹小陰暗的天井，有蔬菜攤和雜貨店。「站在任詩克地下室的家門口，可以看到整個起而喜巴赫街(Kirchbachstrasse)，兩排五層樓的房子中間滲入了一些陽光，一大群家無存糧可言的人，租在這庭院狹小的簡陋公寓[[24]](#footnote-24)」（S.45）。任詩克家陰暗的地下室經常出現在小說中，象徵著小人物惡劣的生活環境和無法掙脫其環境的無奈，被父母寄予厚望的任詩克大兒子阿圖爾(Arthur)是小人物無法掙脫環境的代表，「阿圖爾到學校去，還是可以聞到從地下室來的味道，枯爛的白菜，腐爛的白菜，」「這地下室!地下室!他源自於此，他的眼睛已經習慣昏暗的地下室，教室明亮的光讓他瞇起眼睛」(80)。她將自己課業差歸咎於自己出生的環境，他對他父母說:「你看不出來我是從地下室來的嗎!我不適合念大學，讓我做適合我做的事」(82)。蜜娜和貝爾塔進城來到任詩克家經歷的是夢想破滅的開始，城市人的勢利，居住環境的擁擠並未比家裡好多少。

**女僕的工作**

一般人印象中女僕工作是戴著漂亮的頭巾、抹灰塵、擦銀器。事實上，她們的工作都是日常瑣碎的家事，在沒有家庭電器的時代，家事是件繁重的工作，洗衣服就是一件非常耗時耗力的事，所以常須請一位專門洗衣服的人，當時取暖的壁爐是燒煤的，要維持家裡的乾淨必須耗費很多的時間，煮食也是在燒柴的爐灶上，加上沒有冰箱，幾乎須天天上市場買菜。而她們的工作和雇主家的情況有密切的關係，這些雇主不乏有錢的高官王公貴族或企業家，但是大部分是小商人，小酒館主人，手工業者或是普通的公務員，在柏林有一半的女僕在小商人，小酒館，或是手工業者家庭。四分之一在中間階級人家，有四分之一在上層的中產階級家工作[[25]](#footnote-25)。

**工作時間**

女僕經常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小時[[26]](#footnote-26)，周末時也幾乎沒有時間，大都是星期日下午五到六小時的出遊時間，根據史地利西的調查，1911年時百分之七的女僕可以每星期休假，百分之八十五的女僕只能兩個星期放一次假(Stillich 1902: 135)。大部分的女僕工作時間超過十六小時，其他的是十二到十六小時[[27]](#footnote-27)，基本上女僕住在雇主家，她幾乎是日夜待命的，有一個女僕在警察局抱怨她的雇主星期天晚上九點時，叫她將地下室上百根的木炭搬上來，雖然第二天木炭還夠用，但警察說，「即使雇主晚上十二點叫妳做，妳也要做」(Stillich 1902: 8)，根據問卷調查有百分之五十五點五的女僕回答他們有時須在晚上十二點時工作，她們的工作經常很吃重，有一個工作一年半後離職的女僕這樣寫著:

我十五歲時當一般的女僕(Mädchen für alles). 必須照顧一個小孩，煮飯，和做所有的家事，下午時要和小孩出門，所以所有的家事都要留到晚上，洗衣服的日子我還必須一個人從晚上洗衣服洗到早上[[28]](#footnote-28)，第二天晚上主人受邀到宴會晚上三點才回來，看到我在睡覺，罵我不可靠之類的話，當我說前夜我整夜沒睡時，他說我大膽(Stillich 1902: 125)!

雇主經常將女僕當作機器，絲毫未考慮到她們的需要。《每日麵包》對這樣的情形有逼真的描寫。蜜娜的雇主馮沙德(Von Saldern)生日宴會那天，整天的準備工作已經讓蜜娜昏頭轉向了，她除了煮菜之外還要照顧小孩，當她覺得頭暈，坐到床邊時，馬上又聽到女主人說:

蜜娜，蜜娜，你跑到哪裡去了­­，帶小孩子上床睡覺，把要烤的東西放進烤爐，馬鈴薯你還沒削，蜜娜! 蜜娜! 我拜託你，快一點! 我必須躺一下，我快暈倒了(162)。

忙了一天女主人已經累昏了，但她從未想到和她從早忙到晚的蜜娜也一樣疲倦，到了宴客時疲憊不堪的蜜娜，不小心把湯汁濺到客人的衣服上，嚇得差一點把碗摔到地上，女主人說:「小心一點，和善一點!」女主人特別叮嚀她對客人應該和善點，天生不善言辭又笨拙的蜜娜勉強自己裝出微笑(163)。她不自然的表情，笨拙的樣子惹得客人忍不住捧腹大笑。最後在客人離去時，她累得坐在樓梯上睡著了，「第二天她被辭職了，對她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馮沙德太太哭著說，這麼讓人丟臉的女孩子，還付她這麼多錢」(164)。蜜娜在慕德勒家工作也很辛苦，慕德勒家有五個小孩，太太身體很虛弱，蜜娜每天做家事還要照顧孩子，「她累得坐在床上，眼皮快睜不開了，益而瑪(Irma)還不安的哭鬧，她有時要推推車子，有時要將她抱在手上搖，她幾乎是半睡的狀況下做這些事」(242-3)。後來蜜娜幫人洗衣服，哈伯康太太(Frau Haberkorn)請蜜娜幫她洗衣服，要求她在結婚第二天早上準時七點到她家洗衣服[[29]](#footnote-29)，她認為女僕是應隨傳隨到。這些描寫反映了女僕過度工作的情況，雇主對女僕有許多過度的要求。

**女僕居住的環境**

當時女僕住的地方，常被人所所詬病，很少有一個真正的房間，有時是通道的一個角落，浴室或是雜物間，在柏林很多的女僕住在所謂的半樓(Hängeboden)，所謂的半樓本來是鐵線和木頭做成的一個大吊籃，掛在屋頂下，當作儲存東西和糧食的地方，後來變成女僕居住的地方，會做得比較牢固，根據史地利西的統計，在柏林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女僕住在半樓[[30]](#footnote-30)。有些女孩子還說他們的房間是個雜物間，有家具，舊衣服，骯髒的衣服等。「很特別的房間，只有通風口，沒有窗戶，有床，籃子，髒衣服，發霉的外套和床單」(參考 Stillich 1902: 199)。在逢塔納(Theodor Fontane) 的作品，《史特赫林》(Der Stechlin)有一段女僕賀德維西(Hedwig)談到半樓的情形。

這種半樓大都在廚房，靠近爐子邊，或是在爐子的對面，要爬樓梯上去， 太累了就會摔下來，不過大部分還可以爬上去，爬上樓後打開門，爬進去一個洞，很像進入烤箱，這就是所謂的睡覺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說，睡在草堆上，即是草堆上有老鼠，都比睡在那裏好，最難受的是在夏天，外面三十度，爐子又整天燒火，人好像躺在烤爐上，我剛到柏林時就是這樣，不過現在好像不能建了，警察禁止(Fontane 1978:170)。

賀德維西後又談到浴室，她的叔叔說浴室的發明是種進步，但她說將浴室當作睡覺的地方就不是進步，她說:

馬廄設備都很高雅，很健康，所以人家說高貴的馬，而且馬廄也很健康，差不多就像牛棚，那裏可以治癒肺結核，從那裏可以看到節球體的合歡，看到海軍艦隊的全貌，後面還可以看到藝術展覽，還有新鮮的空氣。但是在內廷參事那裏…..那個爛浴室!...這裡的浴室不是洗澡的! 這裡的浴室是個雜物間，找不到地方放的東西就堆那裏，包括女僕，我晚上打開睡覺的鐵床架都放在浴缸旁邊，浴缸裡堆滿了啤酒和紅酒瓶，剩下的酒會滴下來，角落邊放了一個洗衣袋，小姐們要洗的衣服都塞在裡面，另一個角落還有個小門((Fontane 1978:171-2)。

在她的口中女僕住的地方還不如馬廄牛棚，主人對待女僕就像廢物一樣安置，《每日麵包》也提到女僕睡覺的地方，蜜納在酒館工作的地方也是半樓，「她在那折疊的鐵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床斷掉的鐵線穿過床墊，一翻身尖尖的鐵線就刺到背上，那是一個很小的床，不夠她的身長，她必須彎著身體睡覺，把腳縮起來」(65)。貝爾塔在馮沙德(von Saldern)家的房間非常的狹小，床和牆壁之間只夠擠進一個瘦瘦的一個人，整個房間散發著麝香肥皂的味道(73)，史地利西訪問的女僕提到她住的半樓，

我大部分睡在半樓，那裏我根本不能直站。我睡的半樓有二又二分之一公尺長，也是一樣寬，一又二分之一公尺高，半樓就在廁所上面，有一個不太牢固的梯子，窗戶向著一個狹小的玻璃天井，房子的廁所窗戶就正對著它，你可以想像那是甚麼樣的味道(Stillich 1902:204)。

由於半樓空間狹小低矮，通風不良，1887到1897年間警察建築法規定不能當作女僕的房間使用，但根據史地利西的記載，顯然這時候半樓還是普遍使用作女僕的房間，1897年後蓋的房子根據建築法規的規定，女僕的房間少要有2.80公尺高，但是受訪的女僕很少能住到這樣的房間，《每日麵包》並未別強調女僕的住處，但是對雇主的房子會加以描述，如蜜娜的雇主慕德樂這種小公務員的家，

裡面相當暗，有點潮濕，大一點的房間由窗簾隔成兩間，一間是餐廳，另一半是慕德樂太太和三個大孩子的房間，走廊上一個小小陰暗的地方是慕德樂先生的房間，廚房邊的小房間睡著蜜娜和兩個最小的小孩。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間客廳，內有淺藍色家具，那是他們的聖殿。(S.232-233)

有此可見當時一般人普遍的居住環境都很狹小，根據維爾玲的研究，女僕對其住處抱怨並不多，倒是一般的社會改革者將它視為改善女僕生活的重點(Wierling 1987 :94-95)，瓦爾舍(Walser)也指出女僕希望的是住的地方可以和主人分開，能有自己私人的空間，不喜歡被控制、或監視的感覺，他們對於空間的要求不多(Walser 1985 49-51)。從女僕原生家庭簡陋的居住空間，可以了解她們對於居住空間的要求不會太多，小說中蜜娜和貝爾塔從未抱怨住處，菲比描寫重點是整個低下階級的生活空間，而未強調女僕的居住環境。

**工作紀錄簿(Dienstbuch)**

工作紀錄簿的規定源於1530年，當時規定僕役離職再找工作時需有上一位雇主發的證書，證明其開始工作和離職的日期，以防僕役逃走，這種工作紀錄簿沿用到二十世紀，由警察單位換發，記載女僕到職和離職的日期，本來這簿子上不能有雇主對女僕工作的評語，但普魯士雇工條約171法卻規定雇主對女僕的評語是工作紀錄簿的一部分，1846年到1918年在普魯士的工作紀錄簿上還需有相片，女僕違法受罰的事也會記載，兩年後可以更換一本新的簿子，警察可以更正雇主對僕女不實或不公平的紀錄，但是一個僕女的說詞往往無法對抗一對夫妻或一家人的說詞。根據雇主條約，雇主有許多理由解雇女僕，如危害雇主健康或生命，傷風敗俗的行為，拒付必要支出，生重病等，吵架也可以視為對雇主生活的干擾。為預防他們逃跑，雇主也可以將其薪水當押金，或是當她們打破貴重物品時的賠償金，她們也禁止其在家接待自己的客人(參考Walser 1986 :33-34)，史地利西指出，對於警察機構，女僕有種抗拒感，他的研究指出，353位女僕只有68位曾請警察協助，因為根據他們的經驗，警察都站在雇主一方。服務紀錄簿上主人對女僕的評語需經過警察的認證，這裡記載者女僕的名字、出生地、個人特徵，主人記載女僕換工作的日期以及換工作的原因和評語。不好的評語會讓女僕找不到工作，而陷於生活的困境，兩年才可以換一本新的簿子，很多女僕為了自救，只好稱說簿子掉了，1884到1890之間每年差不多有1000本簿子掉了(參考Walser 1986 :33)。《每日麵包》也寫到工作紀錄簿對女僕求職的影響。

蜜娜即使很勤奮工作，但因她在宴會上表現不當，她的雇主並沒給她好的評語，蜜娜在葉格街的職業介紹所找工作，慕德勒先生來找女僕，

他穿著有點破舊的大衣，帶著擦得亮亮的高帽子。在擁擠的介紹所急忙得在找女僕，在這些推擠的少女和婦女中，他看到了蜜娜，她娓娓縮縮的躲在介紹所的角落，手裡拿著她的工作紀錄簿，當他看她的紀錄簿時，她低著頭尷尬地拉自己的圍裙，因紀錄簿的評語並不好，但他未動聲色，如果一個人不是很有錢，也不應該提出高的要求，再加上家裡有五個小孩，他有點擔心的觀察了她，她會接下這工作嗎? 他還不敢說最小的小孩才出生八天，蜜娜也很擔心的偷看他一下，他會用她嗎? 她的評語這麼差?如果他介意這評語，她到哪裡找工作，她又這麼需要這份工作，…當他說:「我付你一個月四十五塔勒!」她心裡的石頭才落下來(231-2)。

貝爾塔去介紹所找工作時，由於她的美貌，很多人對她有興趣，但當他們看到他的紀錄簿時，都拉長了臉退縮了，即使介紹者還跟她們說: 「紀錄簿不代表甚麼! 老闆，這你比我還清楚」(338)。從這段描寫可以看出工作紀錄簿上雇主的評語嚴重的影響女僕的未來，作者很生動的描述出工作紀錄簿對一個女僕找工作時所扮演的角色，它主宰了女僕的身價和未來的命運。

**主僕關係**

根據警察局的資料，柏林1895年有61063僕人，換工作的次數總共有82948次，同樣的在漢堡1895年有28405個女僕 換工作的次數總共有51039次，(參考Stillich 1902:268 )，這數據顯示女僕換工作的次數相當頻繁，史地利西認為雇主家總有一些讓女僕不能忍受的因素，而讓女僕想要離開尋找一個更好的職位(參考Stillich 1902:269 )。女僕換工作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要尋找輕鬆一點的工作，好一點的待遇，短一點的工作時間，但更多的原因是人際關係問題，如和同事處不來，雇主的性騷擾，小孩子的霸道，主人的輕視。維爾玲認為女僕換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找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31]](#footnote-31)(Wierling 1987:70-71)，歐特(Karin Orth)也認為一般從鄉下來的女僕從小就必需工作，很容易適應繁重的工作，所以離開工作常是因缺少雇主的肯定和讚賞( Orth 1993:19)。史地利西提到一位女僕的雇主為了辭退女僕刻意誣賴她偷竊，或是找理由不付女僕的薪水，扣留女僕的東西(Stillich 1902:325-331)。《每日麵包》中的雇主沒有一位像上述的雇主樣刻薄無理，書中有好的雇主，也有刻薄的雇主，蜜娜和貝爾塔碰到的雇主大都是自己生活也不很充裕，女僕是為他們工作的工具，對女僕工作的辛勞未有特別的體諒，他們對待僕人有其一貫的想法和階級觀念[[32]](#footnote-32)，史地利西曾提到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婦女感覺上就像在房間中玩娃娃的小孩，根本不知人間疾苦，談到他們的女僕時，只論其工作效率，勤勞或是懶惰，根本沒考慮到他們是人也有其需求(Stillich 1902:15)。《每日麵包》常描寫這種情況，如蜜娜在馮沙德家因動作笨拙，不懂得與客人應對進退而被辭職，貝爾塔在吝嗇又刻薄的哈伯孔太太(Frau Haberkorn當女僕，那邊安靜的環境對貝爾塔來說是極端的無聊，哈伯孔太太生性節儉，大都自己上街買東西，貝爾塔連出外的機會都沒有，「晚上時非常無聊，八點時賀伯孔太太就親自關掉通往後面樓梯的門，鎖上後就拿著鑰匙到她房間，她連站在門邊和其他人聊天的機會都沒有，她覺得自己好像被關的犯人」(359)。諷刺的是，賀伯孔太太參加拯救孤苦無依的少女組織，並未善待自己身邊的女僕。有一天主人不在，

貝爾塔像一隻野獸從廚房跑到房間，又從房間跑到廚房，她舉其雙手大聲地喊叫，她也想要找點樂子，為什麼她不能找點樂子，想要聽點聲音，即使是自己的聲音，不過她自己的聲音讓她嚇了一跳，她不敢說話了，靜靜地坐在椅子上。(362)

這一段描寫貝爾塔被孤立的幾近發狂的地步，讓人心生同情。在僕役條約中規定女僕不能隨便外出或接待客人，顯然作者發現這樣的條例不人道之處。善待女僕的人有時也會無意中傷害女僕的自尊心，如雇主任意為女僕改名字，蜜娜曾到一家很友善的雇主比克(Biek)家工作，年輕的夫婦家女主人因為自己名為蜜妮，怕搞混名字，所以將她改名為安娜，蜜娜非常傷心，「為甚麼蜜娜很傷心呢，在這裡工作不錯，她中斷洗碗的動作，兩隻濕濕的手放在裙子上，兩眼茫然凝視前方，淚水直流雙頰，她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法保留」(166)。主人雖待她不錯，但是他未尊重蜜娜，只重視她的功能性，這也反映大都市讓人失去個人個性，變成一個只有功能的人，人與人的關係也建立在功能性的關係。在赫爾曼(Georg Hermann) 的《庫比克》(Kubinke)也有一段提到女僕被改名的事，主人問女僕，「你叫甚麼名字?」「我原本叫貝爾塔(Bertha)，可是我上一位主人一直叫我寶琳娜( Pauline)。」 「寶琳娜」(Hermann 1959:53)，這段描寫中女僕對名字的改變沒甚麼特別的感受，主人也未問女僕願意用甚麼名字，而理所當然的用她當女僕時的名字，相較之下，更可見菲比不同的描寫視角(參考 Weiss-Sussex 1998)。另外雇主不願意請懷孕的女僕，蜜娜生完小孩後，她在慕德勒家幫傭，盡心盡力照顧他們家的小孩，贏得雇主的信任和感激，但是當蜜娜說有自己的小孩時，他們夫妻力勸蜜娜把自己的小孩交給他人照顧，或是送到孤兒院(281-2)。對他們或當時的雇主來說，讓女僕將小孩帶在身邊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這裡作者呈現了一個女僕，無能照顧的無奈[[33]](#footnote-33)。菲比特別同情未婚懷孕的女僕，如蜜娜在比克家工作時懷孕了，比克的太太也懷孕了，比克的太太懷孕時受呵護的情形[[34]](#footnote-34)，和蜜娜因懷孕而被辭職趕出家門正成對比。

菲比以描寫女僕的心理情況，揭露撞擊社會上的成規，讓世人了解女僕生活的辛酸，進而更人道的對待她們。菲比雖未以黑白對比的方式呈現雇主與女僕的關係，但是也呈現雇主們某些狹隘的觀點( Pauleweit 1993:232-233)，他們對待女僕的態度是當時一般人習以為常的模式，在小說中則從女僕的角度，審視這習以為常的情形對女僕的折磨。

**女僕休閒時間**

在柏林一般的女僕兩個星期可以休息一次，大部分是星期天，但是女僕從鄉下到大城市生活，離開熟悉的家鄉和親人，投入陌生的城市生活，加上工作繁忙，休閒時間少，少有認識人的機會，生活非常的孤單，有位女僕說「我每個星期天都可以外出，但我不知道我一個人要到哪裡去[[35]](#footnote-35)。」所以很多女僕在休假時是一個人度過或是留在主人家裡，為了排解這種孤單寂寞的情緒，很多女僕喜歡看廉價低級的小說(Kolportageromane)[[36]](#footnote-36)，這種小說在十八世紀廣受僕人階級的歡迎，十九世紀後也一樣，這種連載小說很能迎合僕人的需求，一方面它很便宜，一小本只要十分尼，而一本兩冊的小說要十到十五馬克[[37]](#footnote-37)，它是一種周刊，內容文字簡單，適合工作繁重，沒很多時間好好看書的女僕，戲劇性的劇情為無聊的女僕生活增加色彩。 一心夢想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過好一點生活的貝爾塔，最喜歡看這種小說，「她每個星期花二十分尼買這種由後門送進來的周刊，有時是兩份，無辜受騙的窮女孩和有錢的誘拐者的故事，大城市裡神秘的無恥事件，這些她是百看不厭」(98)。假日則是貝爾塔最期待的日子，「她整個星期想著她的星期天，可惜十四天才一次，對她來說那是荒漠甘泉，她樂在其中」(92)。在星期天是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去跳舞的日子，也是很多女僕的休閒活動。小說中對女僕參加舞會、輕鬆的一面著墨很少，偏重描寫蜜娜在放假時的苦惱，對蜜娜來說，放假是一種苦惱，蜜娜飽受思鄉之苦，特別是放假時，她想找她認識的人，感受一點家鄉的氣息，於是她找貝爾塔，而貝爾塔正高興著和朋友去露天酒館，於是又回到她工作的酒館，「她爬到床上，抱著枕頭大哭，哭著就睡著了，醒來時，天已經黑了，無邊的被遺棄感襲擊著她，真的沒有人關心她嗎?在這陌生的大城市她是這麼孤單嗎」(77) ?在無依無靠寂寞之際，她和那位什麼都不會只會抱怨的表哥阿圖爾[[38]](#footnote-38)在一起，且未婚懷孕，當時女僕未婚懷孕的情形很普遍[[39]](#footnote-39)，維爾玲認為當時在鄉下婚前性行為頗為普遍，她們對性的態度比上層階級開放，所以女僕未婚懷孕的情形較多(34-35)。而在城市裡的孤苦無依，想找個依靠的心理，也是一重要的因素。

**十九世紀女僕的形象**

瓦爾舍提到十九世紀對女僕刻板的形象是妓女或是無我的犧牲者，這樣的形象與當時小說的描述有相當的關係，菲比也是助長這種刻板印象的幫兇( Walser 1986:66)。史地利西的調查中百分之六十的妓女曾當過女僕，但這數據不太確實，另一分調查顯示女僕後，變成妓女還是站在統計數目的第二位(Orth 1993:93)。

有研究資料記載[[40]](#footnote-40)，1905之前三分之一的妓女以前曾從事過女傭的工作，瓦爾舍認為這數據大都根據未婚生子的資料，值得懷疑的是女傭的私生子一定是從付錢的嫖客而來的嗎? 這樣的數據只能說很多的女傭未婚生子，曾有性關係的女性也不能算是妓女，所以作者認為這整個數據有問題，由於工業化的關係，大量在鄉村的女性進入都市，最普遍的工作是女傭，當時自家庭以外工作的女性就有成為妓女之嫌，至於從事妓女工作者以前的工作是甚麼則無數據可考，她們也可能是工廠的工作者，女裁縫師等。她認為當時的資料並未反映真實。而這種說法來自於一般人的想像。當時的小說也助長這種看法(Walser 1986:59-62)。

當時的女僕是中產階級家庭不可或缺的人力，不過在小說中她們往往是陪襯的角色，著名的作家馮塔納(Theodor Fontane)的柏林小說雖以貴族、中產階級為主角，對主人身邊的僕人也有詳細的描寫，這些僕人和主人常有深切的信任關係，他們常是主人身邊多年的忠僕，為寬厚的主人分憂解勞，如《艾菲布里斯特》(Effi Briest)布里斯特身旁的維克(Wike)，艾菲的女僕羅斯維塔(Roswita)、波格普爾斯家庭 (Die Poggenpuhls)中的佛利德利克(Friederike)。這些忠僕外，馮塔納在小說《使特赫林》(Stechlin) 塑造了典型的柏林女僕形象，漂亮、乾淨俐落又伶牙俐齒的賀德維西(Hedwig)，她不會完全順服主人的安排，懂得維護自己的權利，是個自我意識抬頭的小人物。這樣的女僕形象也出現在其他的柏林小說，使丁德(Julius Stinde)的《布赫霍茲一家》(Die Familie Buchholz)中的女僕也是口齒伶俐、氣勢凌人，有時女主人都要對她讓步，另一位女廚不只狂妄、無理，有時還會偷東西。葛雷澤(Erdmann Graeser)的小說《克布郎課一家》(Koblanks)中主僕關係良好，主人大方親切，女僕以忠誠回報。這些小說中的女僕都是居於配角的地位。作者的重點還是中產階級或貴族的人物。赫爾曼的《庫比克》和菲比的《每日麵包》則是以女僕為主角的小說。《庫比克》描寫三位女僕和一位理髮師學徒庫比克的悲劇故事，三位女僕都喜好玩樂，與庫比克都有短暫的情史，如賀德維西(Hedwig)「矮小、節實、圓滾滾的、像一顆歡樂的保齡球頭」(25)，她沒什麼文化素養，最大的興趣是星期天下午哪裡有免費或便宜的舞會，誰將是她下一位的情人，在作家的筆下，她是一位粗魯、沒感情、只顧自己利益的人，性關係浮濫，「對她來說，愛情不是什麼值得深思熟慮或詩情畫意的事，那是一件簡單又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事」(Hermann 1959:89)。當她發現自己未婚懷孕時，還誣賴庫比克為孩子的父親，只因庫比克有收入，可以支付其費用。她們都是物質主義、精打細算、沒道德、沒感情的人，表現出大都會冷漠無情的一面，這裡看不到女僕貧困的生活或悲慘的命運，從事妓女的工作也像開展另一事業。

很多的漫畫也暗示著女僕性開放，引誘主人犯罪的人，有幅漫畫畫著一位女僕將一個士兵藏在櫃子裡，當女主人進來時的對話是，

「天啊!這是誰的帽子?」「太太，這不是帽子，這是我新買的手提包。」「是這樣呀!為什麼阿福(狗)一直叫呢­?該不會是士兵躲在廚房的櫃子裡吧，」「太太，您愛說笑，阿福大概聞到煎肉的味道吧。」[[41]](#footnote-41)

或是「先生?要我去溫你的床嗎? 」[[42]](#footnote-42)這些漫畫都暗示著女僕輕浮不道德，這些畫所呈現的事實上是雇主的擔憂，她們怕女僕因愛談戀愛而忽略工作或是從食物櫃裡偷東西，女僕和男主人調情或發生關係都是女主人的惡夢。另外如女僕奢華的衣服或是她們的休假日都是漫畫的題材。事實上，他們怕女僕穿得太漂亮而引誘男主人，以批評她們不懂節制為藉口( Müller-Staats 1987:105-106)。在《每日麵包》中也提到雇主對漂亮女傭的疑慮，當貝爾塔到馮沙德家幫傭時，她的美麗引起了馮沙德太太的不安。但先生並不受影響。馮沙德太太抱怨著說

我不知道彼得(Peter)和貝爾塔在廚房笑甚麼，你聽!又在笑了，她在做甚麼? 」先生安慰著她說:「親愛的，你不會想成為她的密友吧，這與你何關。」「我當然不想，只想知道她有何企圖。」她又繼續仔細地聽，她格格的笑聲從關閉的廚房門傳出來，」「不應該找這麼漂亮的女傭。」(58)

十九世紀下半葉，社會問題研究越多時，漫畫的題材也改變，畫者也會站在女僕的立場來看問題，在「還不能休息」[[43]](#footnote-43)這張圖裡出現一位疲憊不堪的女僕，坐在床沿上，男主人想要進入，這時的女僕不是誘惑者，男主人是個侵犯者，轉變了女僕的形象。也說明了女僕是社會的被剝削者，是中產階級道德規範下的犧牲者，誘使她們墮落的正是中產階級的主人( Müller-Staats1987:110-111)。

從蜜娜和貝爾塔的形象可見菲比並未脫離當時文學上的女僕形象，一個是忠僕，另一個是聰明伶俐，追求個人利益的輕浮女僕，終淪為妓女。腳踏實地，刻苦耐勞，忠厚老實的蜜娜，就如馮塔納筆下的忠僕，他們對主人忠心耿耿，處處為主人著想，從未有非分之想，蜜娜剛開始在酒館工作，那裏要求敏捷的動作，「現在的工作比在田裡粗重的工作還吃力!，當她一想到學不會把酒倒得杯子上正好有泡沫時，就感到非常的絕望」(65)。但她並未想到離職，只是盡力的適應其環境。後來到馮沙德家也因在宴會上出醜，不熟悉中產階級的社交方式，而被辭職，家裡的父親一直來信要錢，她只好將她辛苦所賺的錢全寄回家，在這種無依無靠的情況下，她只是非常悲傷、絕望，但是她並不怨恨雇主或怪任何人。一直到慕德勒家工作，她才獲得工作上的肯定，在慕德勒家幫忙照顧主人的小孩，將孩子視如己出，即使她無法休假去探望自己的小孩，她也不抱怨[[44]](#footnote-44)，她嫁了阿圖爾後。日子更是難過，以前替人幫傭還有三餐可吃，阿圖爾做不了粗重工作，身體不好又憤世嫉俗，都是靠蜜娜幫人洗衣服做工過活，到最後阿圖爾勢利的父母都要靠她生活[[45]](#footnote-45)，她逆來順受的承擔一切，她辛苦的工作著，有人說她應該保重。她想「對我最好的保重是每天能吃飽，女兒在晚上時不用委屈的說:「我還很餓」(419)。蜜娜在聖誕節正愁著家裡沒吃的東西時，兩個小女孩給他們帶來了食物和兩馬克，後來她又碰到她的舊雇主，慕德勒升官了，他提供阿圖爾一個服務生的工作，讓他們搬到一個有兩個房間一個廚房的新家。故事最後以蜜娜堅定的宗教信仰做結束。她深信「在星星之上，還住著某人，祂也看到了她。」她繼續祈禱，上主求您賜於我們每日的麵包，並寬恕我們的罪」(439)。 蜜娜努力終於獲得了報償，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這樣一個安分、誠實、認真工作的女僕，正是當時中產階級理想的女僕形象，透露出作者心中的期望，一個不奢望中產階級的物質環境，安分守己的做好自己事的女僕，人與人之間親密信任的關係，主人的肯定對她比物質享受重要。蜜娜從一個鄉下女孩，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是其個性使然，她和土地深厚的關係，讓她能在充滿誘惑的都市環境，信守本分，戰勝生活中持續不度的折難。這時我們又看到作者浪漫的農業思想，來自鄉土，熱愛鄉土的人，才能在混雜的城市中，堅守原則，抵擋城市的種種誘惑。

貝爾塔懷抱著好奇冒險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到柏林，在離開村莊時她「臉上充滿著快樂的期待，她的金髮在風中飄揚，她伸出雙手，好像要捉住幸福」(19)。 貝爾塔是個外型亮麗又靈巧的女孩，跟著蜜娜到蜜娜的舅舅家時，就懂得到處幫忙，討人歡心，但她從小就嗜食甜食[[46]](#footnote-46)，第一次求職她就懂得提高自己的身價，謊稱別人要以較高的價錢請她，在工作時她只整天想著兩個星期一次的星期天假期，漂亮的衣服、讓自已看起來像一個「仕女」(66)，她希望自己能像她的主人一樣吃好的食物，用好的東西。人潮、舞會、音樂都是她所喜歡的，在舞會中享受別人的讚美，對於愛戀她的農夫兒子彼得，她則一笑置之，

她才不嫁一無所有的人，在霍普德曼家幫傭她已經了解到，愛情有甚麼用，霍普德曼家沒甚麼錢，用的都是最便宜的東西，霍普德曼先生的舊褲子還要改給兒子小庫爾特穿，太太用錢總是算了又算(93)。

她看不起和她同一階級的人，很明白自己到城市裡的目的，晉升到上一層階級。讓她很難受的是，好吃的東西在她周遭，但是她卻不能享用。「在春天還有新鮮的蔬菜、雞、鴨、整箱的草莓，但是都裝在小盤子上，那只給主人享用」(114)。所以她將她盤子裡的食物丟掉，偷吃主人盤子裡剩下的東西。「她刮鍋子底的糖漿來吃，任何主人盤子裡留下來的糕餅屑她都不放過，舔著沾過甜點的指頭」(115)。有一天不幸被女主人的兒子看見了，他以此威脅並想要性侵她，只好因此辭職。她不斷地換工作，最後自己也沒興趣工作了，她告訴自己，「不要再服侍別人了!哪天也要差遣別人」(415)。這是她心中的夢想，跳脫自己的階級，讓別人服侍她，最後她沉淪到酒館陪客，出賣身體，換取物質享受。

**結論**

貝爾塔和蜜娜是相對的角色，貝爾塔自私，愛花錢，懶惰，好吃，但聰明能言善道。蜜娜則是標準的鄉村女孩，外表笨拙、拙於言辭、勤勞、節儉、忠厚老實，結果貝爾塔得到了懲罰。蜜娜則結婚生子，有個自己的家。由此可以看出菲比雖然同情了解女僕的處境，但是還是無法脫離其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她所期待的是一個忠於職責，對主人忠心耿耿的女僕。而漂亮的女僕會變成妓女也是當時普遍的看法[[47]](#footnote-47)，因此瓦爾舍指出菲比是助長女僕是犧牲奉獻者或是妓女這種想像的幫兇，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在此也看到作者的道德觀，勤奮、服從、能幹是種美德，懶惰、虛榮、將自食惡果。

對照小說與現實的女僕情況，可以看出菲比致力呈現真實的柏林女僕生活，從女僕的出身，工作的環境、情況，以及離職後的情況皆以事實為根據，最熱門的職業介紹所葉格街也出現在小說中，與其他描寫女僕小說不同的是，菲比描寫的重點是女僕的內心世界，如蜜娜一個鄉下小孩到大城市內心的孤單寂寞，貝爾塔想吃甜食的渴求，(讓人不禁反省主人是否應該將食物分享給僕人)，追求物質生活的慾望，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寫。也達到菲比自己對這小說的期望，讓大家對女僕的生活更了解，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經由了解而有更多的諒解。赫爾曼的《庫比克》也以女僕的生活為重心，但是描寫的是女僕在城市中輕鬆，幽默的一面，人物的個性平面化，反映大城市不道德的文化。兩本書相較之下，可見身為女性的菲比更能深入女僕的內心世界(參考 Weiss-Sussex 1998)，為十九世紀的柏林女僕留下歷史重要的一頁。

參考資料

朱貞品。《德國鄉土文學與台灣鄉土文學之比較－以克拉拉．菲比和王禎和的鄉土書寫為例》。台北:輔仁大學。2010。博士論文。

Fontane, Theodor. *Der Stechlin.* Stuttgart: Reclam, 1978

Hausen,Karin, ed. *Frauen suchen ihre Geschichte.* München: Beck, 1983

Hermann, Georg. *Kubinke*, Berlin: E. Fleischel＆Co,1959

Krauß-Theim, Barbara. *Naturalismus und Heimatkunst bei Clara Viebi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2

Müller, Heidi, *Dienstbare Geister-Leben und Arbeitswelt städtischer Dienstboten.* Berlin: Reimer, 1985

Müller-Staats, Dagmar, *Klagen über Dienstboten.*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Verlag, 1987

Neuhaus, Volker and Michel Durand, ed. *Die Provinz des Weibliche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4.

Nipperdey，Thomas.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ünchen: C.H Beck,1990

Orth, Karin, *Nur weiblichen Besuch-Dienstbotinnen in Berlin 1890-1914.*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3

Ottmüller, Uta, *Die Dienstbotenfrage*. Münster: Frauenpolitik Verlag, 1978

Pauleweit, Karin. *Dienstmädchen um die Jahrhundertwende-im Selbstbildnis und im Spiegel zeitgenossischer Literatur*. Frankfurt am Main, 1993

Schultz, Violet, *In Berlin in Stellung*. Berlin: Hentrich, 1989

Stillich, Oskar. *Die Lage der weiblichen Dienstboten in Berlin.*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soziale Wissenschaften, 1902

Tischner, Christian, *Dienstmädchen im 19.Jahrhundert*, Norderstedt:Grin Verlag, 2004

Viebig, Clara.*Mein Leben.* Ed. Christel Aretz. Briedel: Rhein-Mosel-Verlag, 2002

\_\_\_ *Das tägliche Brot.* Berlin: Das neue Berlin, 1905

\_\_\_ *Eine Handvoll Erde.* Berlin: Das neue Berlin, 1952

Walser, Karin. *Dienstmädchen:Frauenarbeit und Weiblichkeitsbilder um 1900*, Frankfurt a.M.1985

Weber-Kellermann, Ingeborg. *Frauenleben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C.H Beck

Verlag, 1983

Weiss-Sussex, Godela. „Two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Maidservant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erlin: Clara Viebig’s *Das Tägliche Brot*(1901) and Georg

Hermann’s *Kubinke*1910”.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51:3 July ,1998

Wirling Dorothee. *Mädchen für alles.* Berlin: J.H.W. Dietz Nachf. Verlag, 1987

附件一

以下是Wilmersdorfer Akademikerfamilie 的家務時間表。參考 (Schultz 1989:37)

|  |  |
| --- | --- |
| 6:00 | 起床 |
| 6:00-- 6:30 | 整理女孩子的房間 |
| 6:30—7:00 | 整理餐廳 |
| 7:00—7:30 | 整理客廳 叫主人起床 |
| 7:30—8:00 | 清理走廊，整理咖啡桌 |
| 8:00—8:30 | 吃早餐，鋪床 |
| 8:00—9:00 | 清理桌子，到沙龍間除塵 |
| 9:00—10:30 | 整理臥室，後面的走廊，衣櫃間，浴室，準備煮飯燒菜 |
| 10:30—11:00 | 整理廚房，清洗餐具，準備東西 |
| 11:00—1:00 | 燒菜煮飯，鋪餐桌 |
| 1:00—2:00 | 吃飯 |
| 2:00—3:30 | 整理廚房，倒垃圾 |
| 3:30—5:00 | 換衣服，購買第二天的食物 |
| 5:00—7:00 | 縫補衣物，擦靴子 |
| 7:00—8:00 | 揭去床罩，整理房間，舖餐桌 |
| 8:00—9:00 | 收拾餐桌，洗碗盤，拿木材和木炭上樓 |
| 9:00—10:00 | 自由休息時間 |
|  | 每一個星期三下午做完工作後為自由時間，每星期六是大掃除日。 |

附件二:半樓的圖片，參照Müller-Staats, Dagmar, *Klagen über Dienstboten.*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Verlag, 1987. S.182



參照如上,/ S.183。



以下的統計是史地利西回收205女僕的問卷和75位雇主對女僕住宿的資料。參照(Stillich 1902:200)

|  |  |  |
| --- | --- | --- |
| Art der Unterbringung  住處 | Angaben der Dienstmädchen  女僕的資料 | Angaben der Herrschaften  主人的資料 |
| Hängeboden 半樓 | 128 (62.4%) | 45(60.0%) |
| div.Kammern 小房間 | 27(14.7) | 5 (6.7) |
| Badezimmer 浴室 | 18(8.8) | 8(10.7) |
| Küche廚房 | 15 (7.3%) | 13 (17.3%) |
| Keller地下室 | 7 ( 3.4%) | 1 (1.3%) |
| Corridor走廊 | 6 (2.9%) | 3 (4.0%) |
| Werkstatt 工廠 | 1( 0.5) |  |

附件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往的職業 | 妓女的數目 | | | | | |
| 1873 | | 1900 | | 1907 | |
| 人數 | 百分比 | 人數 | 百分比 | 人數 | 百分比 |
| 女僕 | 794 | 35.7 | 379 | 22.4 | 20 | 30.3 |
| 工廠女工 | 355 | 16.0 | 300 | 17.7 | 10 | 15.2 |
| 家庭手工業，店員 | 936 | 42.0 | 176 | 10.4 | 15 | 22.7 |
| 酒館工作人員 | 139 | 6.3 | 171 | 10.1 | 9 | 13.6 |
| 其他職業 |  |  | 663 | 39.4 | 12 | 18.2 |
| 總數 | 2224 | 100 | 1689 | 100 | 66 | 100 |

1873 Paul Kampffmeyer. Die Prostitution als soziale Klassenerscheinung und ihre sozialpolitische Bekämpfung, Berlin 1905, S.115。參考(Stillich 1902:250)

附件四



附件五



附件六



1. 在柏林1880 約有62000的女僕，1890年 85000，1900年126000，1905年 148000。 參考

   Silvia Kontos, Karin Walser, “…weil nur zählt, was Geld einbringt“, *Probleme der Hausfrauenarbeit,* (Gelnhausen/Berlin 1979)。引自 Karin Walser. *Dienstmädchen-Frauenarbeit und Weiblichkeitsbilder um 1900.*(Neue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86 )S. 18。本文的德文皆由筆者譯。 [↑](#footnote-ref-1)
2. *Das herrschaftliche Dienstmädchen.*( Berlin ,1900) S.3.引自Oskar Stillich .*Die Lage der weiblichen Dienstboten in Berlin.* (Berlin :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Wissenschaften, 1902) S.9 [↑](#footnote-ref-2)
3. *Grenzboten*, 59. Jahrg.270. No 14. Page 7， 同上。 [↑](#footnote-ref-3)
4. 他本身是以下雜誌的記者，*Zeitschrift für die Interessen aller Dienenden. Unser Blatt. Berliner Dienstboten-Zeitun。.* [↑](#footnote-ref-4)
5. 他是“Unterstützungsverein der Dienerschaft Deutschlands“ 的主席，這社團參加者大部分是男性 門房、司機、商人的僕人等。 [↑](#footnote-ref-5)
6. 柏林沿用了1810年所制定的僕役條例，在這些條例中僕役須完全屈服於主人的意志，他們應該完全的順服，聽從主人的差遣，主人也能處罰他們，完全與1900年中產階級法律條文中所訂的合約，雙方應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的規定相反，如僕役法的法規第77條，規定僕人只要一句污辱主人的話，就可終止合約關係，但是僕人須拿出證據，證明主人企圖謀害其生命，才可終止合約。這不平等的僕役條約到1918年才終止。參考Violet Schultz. *In Berlin in Stellung*. (Berlin: Hentrich, 1989)S.18。 [↑](#footnote-ref-6)
7. U*nser Blatt* 8.10.1899。引自(Karin Walser 1986:98)。 [↑](#footnote-ref-7)
8. 依照出版的年份有*Dilettanten des Lebens(1898), Es lebe die Kunst!(1899), Das tägliche Brot(1900), Einer Mutter Sohn(1906), Die vor den Toren(1910), Das Eisen im Feuer(1913), Eine Handvoll Erde(1915), Töchter der Hekuba(1917 ),Das rote Meer(1920), Die Passion(1925), Die mit den tausend Kindern(1919), Charlotte von Weiß. Der Roman einer schönen Frau(1930), Der Vielgeliebte und die Vielgehaßte(1935)* [↑](#footnote-ref-8)
9. 「die begabteste Schülerin Zolas in Deutschland」,Wilhelm Lindemann,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9,10.Auf., hg. U. Teilw. Neu bearb. V. (Max Ettlinger, Bd.2 Freiburg :1915) S. 649。參照 Krauß-Theim, Barbara. *Naturalismus und Heimatkunst bei Clara Viebi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2，S. 28。 [↑](#footnote-ref-9)
10. Carl Becker, Clara Viebig als Novellistin, in: *Der Zeitgeis*t. Bleiblatt zum Berliner Tageblatt(1903) Nr. 18。參考(Krauß-Theim 1992: 28)。 [↑](#footnote-ref-10)
11. 凡是有關柏林女僕的書都會引用每日麵包的描寫說明當時的情況，如Karin Orth. Nur *Weiblichen Beusch-Dienstbotinnen in Berlin 1890-1914* ，Dorothee Wierling. *Mädchen für* *alles,* Karin Walser.*Dienstmädchen-Frauenarbeit und Weiblichkeitsbilder um 1900*. Violet Schultz.*In Berlin in Stellung-Dienstmädchen im Berlin der Jahrhundertwende.*等。 [↑](#footnote-ref-11)
12. 「中間階層」指的是比無產階級上一層的社會階級，他們包括因工業化、商業化而產生的職員（Angestellte），在農業、森林業、礦業、工業、貿易、交通（不包括店員）等行業的人，1882 年大約有307000的職員，1907年有 1291000個職員，1913年的職員共有1百40萬人。這些人都是所謂的中間階層。位階低的公務員也屬於這種新的中間階層，1907年整個公務員有1.2百萬到 1.6百萬人。其中有多數是郵政和鐵路的公務員，小學老師也是小公務員。參考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I: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München: C.H Beck, 1990）S. 374-380 [↑](#footnote-ref-12)
13. 手工業者(30.1%)，工人家庭(24.1%)，農夫(17.3%)， 管理工作的工人(9.8%)，公務員家庭(7.8%)，其他(服務生，老師)，(6.3%)未答者。Else Kesten-Conrad, Zur Dienstbotenfrage. Erhebungen der Arbeiterinnenschutzkommission,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d. 31(1910)S.548。參考 Wierling Dorothee. *Mädchen für alles.* (Berlin: J.H.W. Dietz Nachf. Verlag, 1987) S. 26。 [↑](#footnote-ref-13)
14. Vgl. Mittheilungen des Statistischen Bureaus in Berlin, 5-1852, Nr. 19, S. 239 über den Dorfhandwerker。參考 (Wierling 1987:28)。 [↑](#footnote-ref-14)
15. Emanuel Sax, Die Hausindustrie in Thüringen, 3. Teil, Jena 1888, S. 55。參照( Wierling 1987: 30)。 [↑](#footnote-ref-15)
16. Franz Rehbein. *Das Leben eines Landarbeiters(1911*), (Reprint: Darmstadt, 1973)S.7。參照Karin Orth *Nur weiblichen Besuch-Dienstbotinnen in Berlin 1890-1914.*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3)S. 17。 [↑](#footnote-ref-16)
17. Im Kampf ums Dasein! Wahrheitsgetreue Lebenserinnerungen eines Mädchens aus dem Volke als Fabrikarbeiterin, Dienstmädchen und Kellnerin. Mit einem Vorwort von Dr. G. Braun. Stuttgart, 1908, S.31。參照Pauleweit, Karin. *Dienstmädchen um die Jahrhundertwende-im Selbstbildnis und im Spiegel zeitgenossischer Literatur*.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3 )S. 28。 [↑](#footnote-ref-17)
18. 以下有關《每日麵包》的引文，只標頁數。 [↑](#footnote-ref-18)
19. 在《柏林女僕實況》中一位女僕提到她於1882年去柏林幫傭，她會選擇柏林的原因是有位當警察的親戚告訴她們，在柏林幫傭的薪水比其他城市高 (Stillich 1920:324)。 [↑](#footnote-ref-19)
20. 這是當時柏林最有名的介紹所，1901年在二月一日到七月二十一日間有19818的女性和9067位男性透過這裡的仲介找到工作，年收入有101933馬克 (Wierling 1987:77)。 [↑](#footnote-ref-20)
21. 「這位鼻子小小的，有和善的小眼睛的高大男人，就是母親唯一的弟弟，也是母親的驕傲，她口中的大財主，她很喜歡講他幸運的故事給小孩子聽，也講給別人聽」(28)。 [↑](#footnote-ref-21)
22. 住一晚二十分尼，吃一天三十分尼(S.33)。 [↑](#footnote-ref-22)
23. 任詩克家的房子， 除了店面和一個大房間外，就只有一個小房間和一間廚房。大房間有一架鋼琴，用簾子隔起來的是夫妻的臥室，這房間的右邊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裡面放著馬鈴薯和擦東西的沙子以及幾條狗。那一個小房間是他們的大兒子阿圖爾的，這房間位於地下室。他們的女兒Trude ,Grete 睡在廚房餐桌變成的床，小女孩則睡在大房間的沙發上。 [↑](#footnote-ref-23)
24. 在《威廉時代的柏林》提到當時柏林這種五層樓的房子，有百分之22.6的這種房子，裡面住有100-300個人，26000家的住家在地下室，1903年的房屋調查顯示，788.809的柏林人的家裡只擁有一個有暖氣設備的房間而無其他房間，或是擠在一個“客廳廚房“。參考 (Krauß-Theim 1992:201)。 [↑](#footnote-ref-24)
25. 大都數的女僕是甚麼都做的Mädchen für alles，Hausmädchen指的是家中有兩位女僕以上的家務僕女，她們的地位比較高些，廚師需要經驗，所以薪水也較好 根據1900年O.Stillich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45%的女僕是Mädchen für alles， 27%是Hausmädchen , 28%是廚師 (參考 Walser 1985: 25)。 [↑](#footnote-ref-25)
26. 女僕工作的內容請參考附件一。 [↑](#footnote-ref-26)
27. Mädchen für alles的時間經常超過十六個小時，百分之五十的廚師和Hausmädchen，需工作超過十六個小時，在餐廳或小工廠的有時要工作超過18小時。 [↑](#footnote-ref-27)
28. 洗衣服在當時是個費時費力的工作，很多女僕在接工作時就聲明她不洗衣服，也很少雇主讓女僕一個人洗衣服，有專門為人洗衣服的工人，大洗的日子必須先把衣服分類，髒的衣服，有顏色的，白色的等。接下來是將衣服用冷水浸軟，將油漬骯髒的地方用清潔劑在冷水中搓揉乾淨，再燒熱水，在熱水中加入蘇打，再倒入冷水浸泡的衣服，然後開始用手洗衣服，再經過煮沸，沖洗等繁複的過程，最後還要曬衣服，燙衣服(參考Violet Schultz 31-35)。 [↑](#footnote-ref-28)
29. 「你明天過來洗衣服」「明天!對不起!明天是我結婚的日子，」這位太太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幾個小時總是有吧! 那後天好了，七點準時。」(299) [↑](#footnote-ref-29)
30. 參考附件二。 [↑](#footnote-ref-30)
31. 她提到Frau Bahl的例子。她本來在圖林根的農莊工作，主人也對她很好，在此她認識另一個女僕，兩人成為好友，這位女僕遊說她離開無聊的莊園到Mühlhausen 城裡去，到了城裡，這位女僕突然很想家，就辭職回家了，Frau Bahl的母親已去世，繼父再娶，她不想回家，想到母親有表哥在Dortmund，於是又到Dortmund 幫傭，她的主人後來要搬離Dortmund並邀同行，但她已適應新環境，後在此結婚。有此可見她離開的原因並非要尋找更好的職位，而是怕孤獨一人，喜歡有親人或朋友在身邊(Wierling 1987:70-1)。 [↑](#footnote-ref-31)
32. 當時的德國是個明顯的階級社會，1918年德國婦女尚未有選舉權，1849-1918德國將納稅者依其稅金之多寡分為三級，各不同層級卻有同樣名額的候選人，然而第一級的有錢人佔人口的百分之五，中間階級佔百分之十三，大部分的人是第三級者佔百分之八十二。由此可見德國社會階級意識強烈，上等階級者總想保有其階級位置，一般的中產階級婦女也認同威權社會的階級思想，參考Ingeborg Weber-Kellermann . *Frauenleben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C.H Beck Verlag, 1983) S.122-123。 [↑](#footnote-ref-32)
33. 雇主不願意請懷孕的女僕，蜜娜只好辭職，蜜娜因為鄉下家裡不願意幫她照顧小孩，又找不到其他人幫她照顧小孩，曾想過放棄小孩。事實上在柏林有「年輕女性保護社」，他們照顧剛到柏林的女性，1892年成立Marienheim I在 Borsigstrasse，1898 年成立Marienheim II在Wasserthorstrasse，1898年 Marienhaus Y在 Marburger Strasse。在這裡他們除了提供一些住宿外，也提供一些活動，這些機構在小說中都沒出現過，作者刻意呈現一個未婚懷孕的女僕悲慘的命運(參考Orth 1993:25)。 [↑](#footnote-ref-33)
34. 比克先生要蜜娜好好照顧她懷孕的太太，他說:「她起床時給她喝茶，她早上不太喜歡吃東西，十一點時給她兩顆蛋，十二點她去接我之前給她一點餅乾和一杯紅酒…最重要的不要讓她站上椅子或提東西，你要餵小鳥，因為鳥籠有點高，你是個明白的人，好好照顧她!」(167)。 [↑](#footnote-ref-34)
35. Das Hauspersonal, Jg. 1910, S. 423 Karin Orth. *Nur weiblichen Besuch-Dienstbotinnen in Berlin 1890-1914.*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Verlag, 1993)S. 88。 [↑](#footnote-ref-35)
36. 又稱為「後門小說」Hintertrepperomane，因這種小說都由後門送進來的。 [↑](#footnote-ref-36)
37. Vergl. Die Angebote in der zeitgenossischen Berliner Presse。參考 (Orth 1993:88)。 [↑](#footnote-ref-37)
38. 阿圖爾是她母親第一次婚姻中生下的小孩。 [↑](#footnote-ref-38)
39. 根據統計，1890-1896年在柏林出生的私生子有三分之一的母親是女僕，(Karin Orth 97) 14.8%的女僕會將私生子帶出城，至於帶到哪裡則不得而知，45.9%給付費的私人保母，27.8%的女僕把他們的小孩交給有執照的保母，(1896-97之間有17502的女性從事這行業)，6.3%的女僕將小孩送到孤兒院( Orth 1993: 98)。 [↑](#footnote-ref-39)
40. 參考附件三。 [↑](#footnote-ref-40)
41. 見附件四。 [↑](#footnote-ref-41)
42. 見附件五。 [↑](#footnote-ref-42)
43. 見附件六。 [↑](#footnote-ref-43)
44. 星期天她該休假時，慕德勒先生又拜託她留下來照顧小孩，她還是說好(242-243)。 [↑](#footnote-ref-44)
45. 勢利的任詩克夫妻的店，也敵不過附近設施好的商家的競爭而沒落，蜜娜後又回到這裡，但是她已經不是以前的蜜娜了，他們全家都靠她生活，最精靈的小Elli 都要奉承她，因為她知道「誰在這裡當家」(451)。 [↑](#footnote-ref-45)
46. 「當小孩時她就會在賣零食的小販家門口逗留一個小時以上，用她和善哀求的眼光看著店裡的甜食，一直到好心的店家拿糖給她吃」(41)。 [↑](#footnote-ref-46)
47. 都市化工業化讓很多單身的女子進入大都會。她們走出狹小的鄉下環境，依循自己的目標生活，成為引人注目的一群，快速的都市化，妓女的數目也跟著增加，因此也引起一種聯想。在外工作的婦女很多從事妓女的工作，這種想像遠超過實際的情況，這種想像的背後心理因素是中產階級反對婦女在家庭外，能獨立自主的工作生活。所以將妓女的增加歸咎於特定性生活放浪的婦女團體，而女僕與主人生活在一起，如果她們對主人不滿意則會到處說出家裡的隱私，會壞家庭的名譽，要求加薪，又常換工作，所以她們是中產階級潛意識的敵人，因此她們以妓女汙名化女僕，讓她們不敢要求加薪，以合理化兩者的敵對關係(參考Walser 1986:61-61)。 [↑](#footnote-ref-47)